



TARIQ ALI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AXIS OF HOPE**

加勒比海盜

希望的轴心

[英] 塔里克·阿里 著
舒云亮 译

作家出版社

加勒比海盜

希望的轴心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AXIS OF HOPE**

[英] 塔里克·阿里 著
舒云亮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6-03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勒比海盗: 希望的轴心 / (英)塔里克·阿里著; 舒云亮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063-8733-0

I. ①加… II. ①塔… ②舒… III. ①委内瑞拉-研究
IV. ①D7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9733号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AXIS OF HOPE @ 2008 by Tariq Ali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Verso Book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加勒比海盗: 希望的轴心

作者: [英]塔里克·阿里

译者: 舒云亮

责任编辑: 赵超

装帧设计: 吴云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210

字数: 185千

印张: 7.5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733-0

定价: 3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言

本书是近年来多次拉丁美洲之行的结果。在过去的六年间，我去了委内瑞拉和巴西几次，亲眼目睹了阿根廷经济的瓦解，还在二〇〇五年首次访问了古巴。通过这些走访，我深信拉美是有希望的。在新自由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体制下，南美洲掀起了一场社会民主运动，对各国的政治产生了影响。这与其他地区（包括美国）的宗教复兴运动相比较，是令人宽慰的。

科林·罗宾逊鼓励我撰写本书。我在伦敦、美国、巴西、阿根廷、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朋友——麦克斯·阿尔维莱斯、阿蒂略·波隆、罗莎·埃利扎尔德、福雷斯特·希尔顿、黛博拉·詹姆斯、亚历克斯·梅因和埃米尔·萨德尔——也以各种方式给了我支持和帮助。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理查德·戈特——自一九六六年起我们就是同志加朋友了——他的经典著作《拉丁美洲的游击战运动》（*Guerrilla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以及他定期离开南美去他担任编辑的《卫报》（*Guardian*）和企鹅拉美图书馆（*Penguin Latin America Library*）的工作，帮助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他最近出版的关于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图书，也延续了那种传统。假如他也把自己出卖给了新秩序（*New Order*），那就有点累了。但他依然是一位海盗。

马尔库斯·雷迪克的《各国歹徒》（*Villains of All Nations*）一书，为海盗进行了极力辩解，这也是令人鼓舞的。他引用英国作家查尔斯·约翰逊船长一七二四年写的一本书，把海盗描写为“航海的英

雄、暴君和贪官的克星，以及自由和勇敢的吹号手”。人们可以对此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但我还是希望，“我们都是海盗”能够成为全球正义运动的常规声音。

感谢《左页》(Verso)伦敦总部的汤姆·佩恩、贾尔斯·奥布赖恩和塞贝斯蒂安·巴炯，他们提出了编辑方面的宝贵意见，还有《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的新老同事佩里·安德森、罗宾·布莱克本、麦克·戴维斯、雅各布·斯蒂文斯、苏珊·沃特金斯和托尼·伍德，无论事关重要与否，他们都给予了一如既往的支持。

在这样的一本书里，我应该强调说明，我的观点是容易引起争论的，但上述任何人都无须为此承担责任。一切责任，都由我独自承担。多年前，英国保守的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把政治说成是“一场会话，而不是争论”。但我们有些具有不同政治传统的人则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而本书肯定会是一场争论。

塔里克·阿里

二〇〇六年七月

目 录

- 第一章 误导的年代 / 1
- 第二章 帝国的忧郁 / 29
- 第三章 愤怒的公牛和一群狡猾的毛驴 / 42
- 第四章 又是玻利维亚 / 76
- 第五章 老人与革命（哈瓦那日记注释） / 96
- 第六章 把过去作为尾声（西蒙·玻利瓦尔的生平） / 127

- 附录一 特奥多罗·佩特科夫：永远的红人 / 141
- 附录二 《世界报》不是最差劲，但是…… / 153
- 附录三 我们吸取了教训：只要没死，就会更加坚强 / 160
- 附录四 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 195
- 附录五 人民的力量 / 221
- 附录六 乌戈·查韦斯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 / 225

第一章

误导的年代

如果邪恶以正义和权威的声音说话，
如果邪恶以仁慈和有理的声音说话，
如果邪恶以适度和经验的声音说话，
来帮助我们避免痛苦。

如果我们真的绝望，
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在铤而走险。
如果我们真的遭遇痛苦，
让我们看到我们确实陷入了痛苦。
如果我们因为恐惧而畏缩，
让我们知道那是因为绝望、痛苦和恐惧。

所以我们不能胡思乱想，
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启示，
已经找到了进出的大道，
仅此就已经改变了我们。

奥地利诗人艾利希·傅立特《夜之祷告》
(Prayer at Night) (一九七八年)

是什么决定和影响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行为？是时代的精神吗？这应该怎么来进行界定？本作者认为，答案是在一个反革命当权的国家及其联盟的特定社会结构内，人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过程。那又该如何解释标志着二十世纪结束时的大规模转轨？大批大批的政治家、学者、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全都集体接纳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更不用说那些搭便车的野心家了。凭借敏感的本能，他们明白，政治文化生活的决定趋势是随大流。于是他们隐藏了所有的想法，摇身一变表示附和。这一切产生了其自己的心理和语言。支撑全球新秩序（New Order）的柱子几乎被看作是神圣的制度，其权威来源于自身存在的这一事实：全球公司是有益的，因为它是一个全球公司，它之所以是一个全球公司，是因为有益的。现实中，这个逻辑就是北约（NATO）的东扩和美国设在一百二十一个国家的军事基地。

广义上说，所有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和垮台，加上美国与共产党阵营（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九一年）的冷战和热战的结束，对许多当时依然赞同左翼的人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那些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抱什么幻想的人，也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就像是十八世纪法国封建王朝复辟之后，很少有人会公开宣称“我是一七九四年的人”——司汤达是一个典型的例外人物，他认为国王路易十六遭处决的那一年是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关键时刻——所以对许多欧洲人来说，一九九一年之后再也不可能说“不管怎么样，我依然是一九一七年的人”。后者还会很快导致有些人得出其他的结论：“我决不可能成为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妇女”，或者“我一直认为，英国工党政府一九四五年对矿山和铁路实施国有化是错误的决策”，或者“法国人对国家的痴迷是从维希那里接管政权”，或者“左翼在西班牙和希腊内战中失利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此等等。

与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形成对比的是，南美洲的忏悔者数量更少。许多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拒绝反对古巴革命。而且甚至那些尖锐批评卡斯特罗的人士，也不赞成对他实施暗杀。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著名人士，其中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但这些人并不能代表在西方学术界和在全球新闻界服务的大多数拉丁美洲人。他们“成熟”了，沦落了，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出卖了灵魂。如果不再学习，就不能获得认可。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似乎是绝对的。华盛顿共识成了霸权主义。新秩序的两个主要理念是：一、从现在起到地球爆炸，资本主义的新模式是组织人类活动的“唯一”方法；二、西方打着自己所称的“人权”标准旗号，粗暴侵犯主权国家。这些理念，以及据此制定的内外政策，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像传染病般地散播开来。幻想被出卖，希望遭丢弃，导致了对过去的痛苦回忆，增强了个人的野心，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识时务者发达了。

第一个理念的结果，是一个空心的民主制度，是政党体系的持续衰退。这在西方更为明显，在印度、巴西和南非也有。政治区别耗尽之后，党派成了空壳，原来旨在帮助政治精英的机制，转而去追求权力和财富。党员数量越来越少，但在一些职业人员和政治地位相等的广告工作人员的操持下，仍有一个微小的基层网络在运行。上世纪，赫伯特·马尔库塞受到了广泛的嘲笑，因为他预计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趋势，正在开创一种消费主义的文化，人类也在由此而大量繁殖，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冷漠和分化的社会。共产党国家的崩溃，加速了这个过程。

一九九一年之后，如果还在谈及政治对抗，即使是在思想层面上，也会被广泛地认为是疯狂的、刺耳的、反常的，依然生活在过去时代。对曾经的左翼人士来说，现在渴望的是归属。这是一种强烈的冲动，许多曾经向往莫斯科、北京、普林基波、科约阿钦、哈

瓦那、河内和马那瓜，甚至极个别向往平壤和地拉那的聪明人，现在都皈依新秩序了。^①当然，在解释政治观点完全改变的时候，个人的心理并不是不重要，但这种现象是如此之广泛，只能视作是整个社会阶层的倒退。^②看到这个变化的社会和政治形势，他们停止了思考。资本主义，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癌症，现在发觉是唯一的药剂。^③在历史的危急关头，如果这不是一种卑鄙的恭敬，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新的信仰其实就是老的信仰。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五百年了，而且历经所有的危机，而社会主义的实际存在时间才七十年，在遭遇第一次巨大挑战的时候崩溃了。这使得资本主义与在灾难中结束的突然发生的社会实验相比，有着古董般的品质。因此，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们在他们的信仰中变得对宗教半信半疑了。他们支持的社会制度是不可改变的，十分可靠的；一旦整个世界都适当地转换过来之后，一切问题都会不复存在。所有的异端邪说都应该清除出去，这样它就能变得自我融洽了。针对这种观点的任何挑战，都应该排除掉。

① 古巴作家和文化部长阿韦尔·普列多有过类似的解释：“古巴革命使他们回想起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以及他们放弃了什么。因此，古巴的事业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它像幽灵般地出现了，这让他们蒙羞，让他们感觉他们已经认输了。”古巴的例子是特殊的。我个人认为，假如我崇敬金日成，那我会感觉非常羞愧。七十年代我的两次平壤之行，留给我的强烈感觉是厌恶这个政权。当时，金日成的一个狂热崇拜者爱尔兰人乔·哈利代，对于我能够去朝鲜感到非常吃惊。他向我保证说，他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但肯定是接近百分之九十五。我期待着在他撰写的金日成父子传记中会有我的过失，虽然我希望看在过去的分上，他不会局限于韩国的情报资料。

② 例子举不胜举，以全球的规模，可以写成一部百科全书。我在附录一安排了一个人物特写。

③ 这原则上指的是政治和大众文化，其中的幻想、神秘主义、非理性、过分依赖心理认知、生活方式和现实电视节目全都兴旺发展了。

如果人们去深入观察那些皈依者的心灵，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空房间里摆放了借来的家具。许多人不愿看到这个事实，但房间里的物品都不是属于他们的。这是新秩序的包袱，对一切都产生了影响：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仪态、他们的油滑，甚至还有他们的衣着穿戴。有时候，原先的肢体语言和拘泥形式的文章保留下来了；瞪着充血的眼睛，举起捏紧的拳头，欢呼一场光荣的帝国战争或政变的到来。由于战争成了灾难，政变已经卑鄙地失败了，自信心的表现只是一种混合着借口和夸口的迷茫。他们那样的人是无足轻重的，代表的是已经被污染了的冰山一角。

一个单一的帝国，但无数个新闻频道支配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除了半岛电视台（al-Jazeera）和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Venezuela's Telesur）两个例外，其他的都是相同的议程。^①把媒体都集中到五六家全球传媒大鳄的手中，更多地是为了促进“政权的更迭”，而不是为了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谎言公司〔包括诸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广播公司（ABC）这样的国有新闻网络〕形成了帝国框架的一

-
- ① 战争时期，为控制公众舆论，对信息的管理是很严格的，任何试图散播违抗命令的消息，都会受到严厉处理。在轰炸南斯拉夫期间，北约承认袭击了贝尔格莱德的电视台，理由是它在进行“广播宣传”。争论说，这样的宣传很危险，相当于为恐怖分子提供弹药，后者也许会据此来攻击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轰炸了半岛电视台，因为该电视台的一名高级记者在报道美军对巴格达的占领，他被列为目标，被美军直升机炸死了。此前，半岛电视台把其在巴格达的地理坐标告诉了美国，以避免遭受“误炸”。结果反而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了故意轰炸。有关视频可在加拿大纪录片《控制室》（Control Room）中见到。泰西尔·阿鲁尼是半岛电视台一位很有天赋的记者，“9·11”后一个月他采访了本·拉登，为此在其出生国西班牙被作为“恐怖分子”遭到了逮捕。目前他被关押在警卫森严的阿尔卡拉-梅克监狱，要服刑七年。很少有人怀疑他的清白，唯一的证据是他抢先获得了采访权。美国或西班牙高级记者如果能有机会采访本·拉登，他们是不大可能拒绝的。布什、布莱尔的跟屁虫提出的口号是“他们仇视我们的自由”，但在需要保卫记者正常工作自由的时候，这些“自由卫士们”沉默了。这位记者是阿拉伯人，在为“敌方”的电视台工作。谁会介意呢？

一个重要层次，用以束缚这个世界。白宫和华盛顿共识推行的朋友/敌人、信徒/异教徒的二分法，主宰了媒体的主流。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曾经评论说，“如果记者用‘他的’真相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力，那就是在用谎言威胁我们的生命”。^①

一个想象，如果断章取义地多次重复，就足以使我们这个人道主义帝国世界的公民深信，该是发动一场战争的时候了。要对南斯拉夫和阿富汗发动战争这样的想象主宰了媒体的报道，但迄今为止，没有照片可以证明二〇〇二年间伊拉克——早些时候的照片描绘了在库尔德村庄曾经少量使用过凝固汽油弹和毒气，由于这是二十年前的照片，一些过来人也许还记得，伊拉克的这位暴君曾经是西方的重要盟友，与在阿富汗的那些大胡子“自由战士”一样。在缺乏想象的时候，就由谎言去填补；即使在遭到曝光之后，也是用谎言去搪塞。

和平时期呢？在思想上必须对贫困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公民展示多样性、不同政见、活跃的公众意见和对抗的政治态度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中国已经证明了，生气勃勃的市场经济甚至连最基本的民主都不需要。今天，新秩序要求的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性，对媒体的管理比过去的年代重要得多了。^② 在新规则适用于帝国政治

① 卡尔·克劳斯《在这伟大的时代》(In These Great Times)，编辑：哈利·佐恩，曼彻斯特卡尔·克劳斯读者出版社，1976年版，第78页。

② 新秩序倡导统一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腐朽没落的媒体看门狗对乔治·克鲁尼执导的电影《晚安，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的评论。英国广播公司文化人马克·劳森，想必是因为一个一贯重要的媒体实际上没有参与，以及他自己的作用的日渐式微，而感到羞耻，于是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不公平，不平衡》(Unfair and Unbalanced)，2006年2月10日刊登在英国《卫报》上：“克鲁尼要媒体改变对诸如伊拉克和石油的这样的事物的双管齐下报道。但布什和石油大亨的支持者们会怎么样？他们会简单地关了电视或者转向福克斯新闻频道？应用默罗-克鲁尼规则的现有右翼电视台，极少会去进行这样的尝试。这些都不能说明，‘客观性’和‘平衡性’是不会引起争议的，或者甚至能够达到目的。所有的报道都有一种姿

和战略各方面的情况下，如何使处于变化之中的世界新闻媒体保持不受影响呢？除了与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少数记者外，对西方的绝大多数记者来说，评判一个政权只有一个基本准则：不是该国家的人权记录如何，而是其属于华盛顿共识的朋友或敌人。华盛顿的盟国可以轰炸城市、拷打人民，犯下战争罪；这可以被描述为很遗憾但很有必要，或者受害人对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巴勒斯坦、车臣、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西方宣扬的思想，很少付诸激烈的实际冲突之中。但在二〇〇二年，美国和欧盟悍然支持委内瑞拉的政变，因为委内瑞拉的民选总统乌戈·查韦斯被认为在该地区触犯了美国的利益。（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新秩序下的政客和媒体看门狗，对临时推翻民选总统的狂热欢呼，不由得让人们想象，这个世界是不是回到了殖民主义残暴镇压当地人民起义的时代。事实上，这样的评论大量出现在许多主流媒体和电视频道中。我们后来看到，这次短命的政变，让媒体的狂欢止于序幕阶段：一个星期之后，将会出现雷鸣般的万事大吉的赞美语。这个插曲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进行多层次的详细阐述。这里只是有必要提示一下，华盛顿共识媒体网络所广泛散播的误导战役。

态：即使用秒表也难以区分三大政党表面装作不偏不倚但暗中接受政治现状的时间。同样地，虽然符合对记者的大多数要求，默罗在现场的闪电报道，既不客观也不平衡；它是建立在希特勒轰炸伦敦是错误的这样的假定。但问题是，除了政变和大屠杀这样的事例，平衡性比党派性，更能为新闻业体现抱负，因为它较少地带有个人或文化的偏见，从而给历史记录带来较好的秩序。因此，《晚安，好运》作为一部电影，从智慧和优雅的角度来看，最好别把碟片送给见习记者作为生日礼物……在媒体的宣布遇上了像对待政客那样的怀疑，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答案当然是不要过多的编辑，而要更多的报道。《晚安，好运》影片是很好的，但逻辑很差。”

马克是好样的。或许见习记者可以受赠如何采访名人的碟片，去讨好他们的领导，由此来发展他们的生涯。在市场经济下，新闻业也是商品。

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对这场政变的报道,一如预见的那样,是有失公平的,常常表现得偏好幻想和心满意足,而不是报道社会政治的现实。常驻加拉加斯的两位相关记者是菲利普·冈森[他兼任了《迈阿密先驱导报》(Miami Herald)的特约通讯员,还根据需要担任所有反查韦斯报纸的御用文人角色],还有安德鲁·韦布-维达尔。他们两人常驻委内瑞拉的时候,正是寡头统治及其政治党派的晚期阶段。从有利的位置观察到一切后,这两个卑鄙无耻的记者就在西方的媒体上为寡头统治煽风点火。冈森是个激进分子,曾经是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运动的游击队员,在革命失利后觉醒了,并对委内瑞拉产生了敌意,他满怀怨恨,全力投入了反对玻利瓦尔革命的斗争之中,早年并不怎么惹眼,但在查韦斯的声望和力量越来越壮大时,他变得狂暴了。韦布-维达尔没有那么聪明,但更为有偏见,他发出了声音,以记者的角度撰写批判文章,其文笔像是当年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真理报》(Pravda)。^①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秩序下,这种卑鄙攻击的文章赤裸裸地表达了他对寡头统治的同情,而《金融时报》认为没有理由去质疑这种“客观性”。

查韦斯政府要接管国有的石油巨头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etróleos de Venezuela)。但公司的高管和工会领导人是由上届政府那些不得人心的政客任命的,他们断然拒绝为新政府工作。委内瑞拉的寡头统治集团及其亲信明白,他们的前途和财源需要他们采取快速行动。对石油公司新的领导班子的任命,成了石油工人工会[附属于已经

^① 《真理报》是苏共中央的机关报,以高唱简化论而闻名。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时间很长。如今,西方媒体大都对那个时期记忆犹新。如同《真理报》路线当年在全球的亲苏媒体上忠实地得到了贯彻一样,今天的华盛顿共识路线,经《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打磨成精细艺术之后,也在各大洲进行忠实的贯彻。

失败的民主行动党（Acción Democrática party）] 举行罢工的信号。寡头统治的执政者与他们在华盛顿和马德里的朋友们深信，没有石油的流动，委内瑞拉的经济将会崩溃，导致全国范围的动荡，因此可以采取由来已久的办法，推翻摇摇欲坠的查韦斯政府。

所以正好在入侵伊拉克的前一年，美国为委内瑞拉的政变开了绿灯。寡头统治的执政者按捺不住狂喜的心情。商会的一位前会长，即使按照委内瑞拉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一个颓废的人，粉墨登场充当总统的助手。然后几个听话的将军命令把乌戈·查韦斯抓起来，并把他关进了一个军事基地。到此为止，一切都很顺利。消息传开后，加拉加斯周边贫民区的穷人愤怒了，他们决定进军总统府——观花宫（Miraflores）。这个时候，总统府内发生了另一个同样具有意义的事件。当媒体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着向全世界介绍这位腐败的总统，把他说成是委内瑞拉民主的大救星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已经为这场政变做了辩解，说是为了加强民主]，一位将军从总统府出来，对军乐队说话了。他通知他们说，一位新总统就要出现了，他们应该像往常那样演奏国歌。乐队士兵们质疑他的命令。将军对军乐队不服从命令很不高兴，他转向一位十八岁的号手，要他在看到总统时吹响号子。“对不起，将军，您说的是哪位总统？我们只知道一位，就是乌戈·查韦斯。”将军勃然大怒，他告诉号手服从命令。这时候，号手把号子递给将军，说：“您似乎对吹号很敏感的，那就给您。您自己吹吧。”这位士兵以后可以自豪地告诉自己的孩子：“我拒绝了命令。”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军队的哗变威胁，胜利地迎来了查韦斯的回归。贫民区的老百姓进军市中心，捍卫了他们的玻利瓦尔政府。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查韦斯之所以遭废黜是因为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明白，委内瑞拉已经开始酝酿一个计划，为的是摆脱美国的支配；因为他们相信，即使是玻利瓦尔革命者的缺点，也胜过反对派的优点。在这场流产的政变发生后

一年，我与来自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的人谈起了我的印象，他们中有些人并不是查韦斯的支持者。

年轻军号手的本能，代表了他的大多数同胞公民的心声。而那些媒体的记者，则按程序来为一场公然反对民主的政变做正面的报道，他们的行为竟然没有一丝羞辱感。在委内瑞拉国内，两家主要的大报没有对查韦斯表现出任何同情（其中一家曾经得到了前几任政府的贿赂或者是其秘密的附属机构，该报纸向玻利瓦尔革命者提出了同样的条件，但遭到了拒绝）。支持政变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西班牙语频道，还有更加公开的古斯塔沃·西斯内罗斯的电视频道。西斯内罗斯是委内瑞拉的寡头统治者所找到的铁杆代表人物。这位拉丁美洲的亿万富翁，未来的默多克或贝卢斯科尼，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政变。与他在其他地方的对手一样，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之所以去为原先的政党服务，是因为他们能够满足他的需求。为表示对他们提供的服务的欣赏，他还启用古怪的财政部长作为个人的政治资金筹集人。他喜欢假惺惺地说，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拉丁美洲的得益。^①除非是有利可图，否则他为什么要把精力花在拉丁美洲上面？早在一九六一年，在世界上的其他人远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他就拥有了国内最大的私有电视频道——委内瑞拉电视台（Venevisión）。现在，这可以作为武器去反对实施金钱权力威胁的野蛮人。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委内瑞拉电视台疯狂地攻击玻利瓦尔革命者，把他们

① “从1980年代起，他把自己的帝国扩展到拉丁美洲，包括智利国际电视公司和哥伦比亚的卡拉科尔电视公司，而且是拉美卫星电视的大股东，通过卫星向拉美二十个国家播送日常的体育节目、游戏节目、肥皂剧和经预先编辑的新闻。他在获利颇丰的美国主要西班牙语频道拉美联视集团中拥有股份，他还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AOL-Time Warner）在拉丁美洲设立了一个互联网的合资公司。”理查德·戈特《委内瑞拉的默多克》“Venezuela's Murdoch”，2006年5-6月《新左翼评论》第39期。

说成是“暴徒”和“猴子”，后者是传统的克里奥尔人对他们黑人兄弟的看法。在树木茂盛的加拉加斯东郊，他们在为这一招而偷笑呢。^①

最先进的媒体技术设备，已经安装到了系统之中，以满足其各种最原始最简单的需求，包括政变和替代民选总统的棘手任务。二〇〇六年七月的墨西哥大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全球的大多数媒体都在宣布右翼新自由主义候选人费利佩·卡尔德隆获胜的时候，一个小巧精干的独立媒体小组正在耐心地分析这个国家在发生的事情；很快人们就知道，他们的关心是有理由的。媒体小组得到了墨西哥独立报纸《工作日》（La Jornada）记者的帮助。那些记者们深信，与一九九八年一样，当局再次窃取了大选。

在初选结果出来后二十四小时内，《缉毒新闻》（Narco News）的艾尔·乔丹诺在三份仔细撰写的研究报告（其质量远远超过西方报刊）的第一份中，对发生在这个国家的腐败行为提出了挑战：

今天在墨西哥，对星期天的总统选举投票开始了“重新计票”……对此，仲裁人表示反对。

联邦选举机构（Federal Electoral Institute）星期二联合比森特·福克斯总统的国家行动党（National Action Party）和候选人费利佩·卡尔德隆，反对重新计票。这个，以及星期二接踵而来的发现星期天的选举中，有二百五十万张选票被联邦选举机构隐藏起来的消息，使得公众对制度的不信任证据越来越多，怀疑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在操纵选举舞弊。

星期三上午八点钟，部分选票的“重新计票”开始了，

① 为在政变失败之后争取恢复自己的名誉，西斯内罗斯找老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并说服他写一部歌功颂德的圣徒传。于是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把西斯内罗斯写成了圣徒，是与野蛮的暴君做斗争的现代英雄。误导的时代需要各个层面的一致性，但对富恩特斯那样的作家来说，被别人利用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太卑鄙了。